

# 朱批是朱批，上谕是上谕

## ——晚清政令的不同传达方式

李文杰

### 晚清朱批和上谕的重大改变

清代的重要政令，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传达：一是君主在臣工奏摺上的朱批；一是另写的上谕。一般来说，朱批是君主的亲笔，偏向口语化，内容较为简单，批答后交还上奏人执行。而上谕则部分是针对奏摺的长篇答复——朱批无法全写，故须另外拟旨；还有一部分则是宣布某项政令，而未必针对特定的奏摺。朱批在体裁不如上谕工整，内容也不如上谕翔实。不过，在奏摺兴起的初期，即康雍时代，君主往往青睐这种直接对话式的长篇朱批。到了清朝中期之后，军机处这一秘书机关的作用逐渐凸显，稍微繁难的意见，都由君主口授大意，交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拟定，再由君主覆审后发出。

除去侧重礼仪及外事的敕、诏、制、诰等文书，与日常政

令相关的上谕可分为三类，都是由军机处拟定：第一类是公开的“明发”，格式是“某年月日内阁奉旨……”。第二类是寄送某个特定对象的“廷寄”，格式是“军机大臣字寄某人，某年月日奉旨……”，廷寄的承旨人是军机大臣，即皇帝身边的大秘书，经军机大臣直接密寄相关责任人，该责任人一般身在外地。第三种叫做“交片”，对象是京中部门衙门，格式是“交某机构，军机大臣奉旨……”。（见图1）按照《大清会典》的说法，交片是军机处行文的一种，但实则军机处传达给京中部门的谕旨（昆冈等修：《大清会典（光绪朝）》卷30，《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不管是朱批还是上谕，都是君主意志的体现：亲笔的朱批固不用说，由军机处草拟的明发、廷寄、交片上谕，其中提到的内阁、军机处都只是承旨单位，而授命者当属君主无疑。这一模式被清人看作避免大权旁落的法宝，在与历朝制度比较时，成为清人颇感自豪的制度优势。但是在晚清时

期，无论是朱批还是上谕，在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一些变化，似无关宏旨；有一些则影响着权力结构和制度的走向。

制度的变化，缘起于1861年，让我们从那一年开始说起。1861年的辛酉政变，早已为后人耳熟能详。政变后产生出垂帘听政和议政王议政的新体制，也改变了原来的政令产生方式。

1861年8月初，避暑山庄里因忧惧而病倒的咸丰皇帝，已无法批阅奏摺。可是，大小国事不能积压，尤其面对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造成的交困之局，军国大事的处置间不容发。咸丰帝并不能像小说野史讲的那样，把手中的朱笔交给妃子。8月2日（六月二十六日），病榻上的咸丰帝收到奏摺后，不再像从前那样批摺下旨，而是将奏摺交给行宫的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阅览，让他们将批阅意见以及详细的拟旨写成签条，夹在奏摺中上呈。等到他们返回意见后，咸丰帝基本上照单全收，并未做太



**编者按：**清宫戏是国剧市场上长盛不衰的题材，不论正剧还是戏说，频频占据话题榜前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身临其境，一会儿随着皇帝陛下君临天下，一会儿跟着一众后妃殊死宫斗。在此过程中，着实增长了不少关于清代军国大事、职官制度、诗书礼乐、宫廷家具、器物、食货、服饰等方面的知识。几乎在所有清宫戏里，都能看到大臣上奏、皇帝批阅的戏码，《文汇报》在此刊发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详细介绍清代政令传达的知识。

大的改签。这种由亲信大臣拟批和拟旨、君主简单确认的模式一直持续了20天，直到22日皇帝驾崩。

在这之后，根据咸丰帝的遗诏，载垣、端方、景寿、肃顺四位御前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位军机大臣共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也就是拟批奏摺，处理日

常政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1册，第263页）。拟批和拟旨的意见，由赞襄政务大臣以奏片和清单的形式上呈，交给慈安太后和小皇帝（由生母慈禧太后代）在首尾钤盖“御赏”与“同道堂”两枚图章进行确认，然后再

（下转12版）➔

（上接10版）

话说，伊斯兰教在19世纪反而成为了塑造现代国家的话语的来源。也就是说，非西方的因素同样可以在现代化中扮演积极作用。如果多了解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的研究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从强调现代化中的西方因素（包括强调本国的亲西方族群的作用，比如强调阿拉伯基督徒的作用）到强调本土因素中蕴含的现代化元素，这在7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研究就是如此，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等第一代学者强调阿拉伯基督徒的中心作用，强调民族主义的舶来品属性，60、70年代后西尔维娅·哈依姆（Sylvia G. Haim）等人指出现代伊斯兰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精神来源，到90年代以后，哈桑·卡雅利（Hasan Kayali）等人强调阿拉伯地方显贵对民族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青年土耳其党



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里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国对全球性“17世纪危机”的反应。



统治的影响，本土的因素越来越被重视，西方中心论的叙事也逐步被解构，这或许是对非西方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进行严肃研究的必然结果。

传统观念中必然要推行到全世界的西方模式，也最终被学术研究祛魅和解构。在引用拜利（C. A. Bayly）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雅伊哲奥卢博士指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了从缅甸到海地的全球性的危机和

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标题所说“革命的年代”。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仅仅是应对危机的两条道路，其他国家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波兰、伊朗等国的探索是失败的，波兰最终被瓜分，伊朗萨法维王朝在集权改革失败后被权力结构松散的卡加王朝取代；俄国、瑞典等国则采取了通过领导人赐予臣民权利的方式进行体制重组；奥斯曼帝国以中央精英和地方显贵在一系列

财政的、政治的纽带中进行合作共享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它既没有崩溃，也没有经历制度的大变革。从宏观来看，作为危机应对方式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很难说是独创的，更不是注定会胜利，必然要被其他国家所效法的。其他国家同样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方中心论的史观和叙事彻底无视了这一面，然而非西方国家探索的价值不应被西方的最终胜利掩盖。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18、19世纪之交市民社会的分析有虎头蛇尾之嫌（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史料不够）。再比如，作者在全书结尾阶段花费了许多笔墨描述地方显贵在后来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然而在指出显贵秩序崛起对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以及帝国对政治新秩序的探索的精神遗产外，他似乎没有对这场短暂探索的实际历史影响做出一个相对详细的评价。

作者的分析框架让笔者想起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里的分析，魏斐德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国对全球性“17世纪危机”的反应，并明确指出清朝的政策在短期内帮助中国走出了17世纪危机，但是从长期来看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面对西方影响时的无力。那么作为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全球性危机的回应，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探索有什么总体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呢？作者的笔锋非常犀利，体现出青年学者的冲劲，但是在评价问题上，作者选择了沉默，这让人有些遗憾。不过，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在同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产生“土耳其热”的背景下，它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给了读者认识奥斯曼帝国的另一种可能，提醒读者：非西方的因素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